

汉语复音词结构特征的文化透视

王作新

初始的汉语,单音词一统语言的天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复音词应需而生,补偿了单音词在语言交际中显露的不足,且在与单音词同伴而行的旅程中,于数量和使用的频率方面渐成壮大之势。对汉语复音词结构特征及其成因的揭示,必将给汉语史及中国文化的研 究带来极大裨益。本文拟对汉语复音词的结构样态予以历时考察,以观其发展轨迹;进行共时比较,而察其结构特征;进而对其成因试作探讨。

一、汉语复音词的结构特征

在传世的上古文献语言材料中,《诗经》呈现出“因声关联”复音词丰富的特点(对此已另有专文讨论)。但由于《诗经》已非复音词萌芽阶段的作品,所以也具有比较可观的据义联结的复音词。(按:或称语法构词,亦即非因声关联的单纯复音词。)据有人统计,《诗经》复音词中动宾式 13 个,附加式 27 个,联合式便约有 200 个,至于偏正式则数量最多,竟约有 400 个,但因绝大多数是名词,所以在 使用或适应的范围上却远不及联合式复音词^①。

《墨子》一书所用复音词为 190 个,以双音节占优势。从结构看,单纯复音词仅 8 个,而 182 个复合词中,联合式便有 102 个之多,占 56%^②。

《吕氏春秋》共有复音词 2017 个,双音节有 1730 个,三音及三音以上者,只有 287 个,且主要是人名(包括封号、谥号)。从结构类型言,单纯复音词为 78 个,仅占复音词总数的 4.1%;复合词中,则以联合式占优势,总数为 438 个,其次是偏正式,为 408 个^③。

上述统计表明,先秦汉语复音词有如下

特征:音节形式上主要呈双音节,结构方式上主要是复合法;而在复合法中,又主要是联合式与偏正式两类^④。史存直说:先秦汉语里,“支配式和表述式虽然有,但不多;至于补充式则尚未产生。”^⑤这是符合汉语实际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复音词虽然增加了一些新的构词方式,如汉代即出现有补充式^⑥,但终究未能动摇复音词结构的主宰者的地位,相反,联合、偏正二式,特别是联合式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化和巩固。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较能真实地反映六朝时代的汉语面貌。对该书复音词调查的结果表明,联合式构词占有复音词总数的 46.4%,偏正式占 36%,其余遗存的单纯复音词(包括固声关联的遗存形式)、新生的音译借词和其他附加、表述、支配、补充各式,总计亦不过 17.6%^⑦。“六朝”以后,“‘联合式’和‘偏正式’在隋、唐、宋时期,乃至以后,一直都是主要的造词方式。”^⑧

《现代汉语词典》所收“A”音起首的复音词(语)共 309 个,其中有四字成语 21 个,三音节及三音以上的多音词 61 个(其中专有名词、音译或音译加类名计 37 个),除此而外,全为双音词,计 227 个,占复音词总数的 70.2%。从构词方式看,227 个双音词,偏正式为 83 个,联合式有 81 个,支配式 25 个,附加式 18 个,音译词和摹声词 13 个,单纯词 7 个,补充式 1 个。由此观之,显见联合、偏正占绝对优势。

北京语言学院所编《简明汉英词典》(91 年 6 月版)以“C”字母起首者,收有汉语复音词(语)937 个,(不包括“从……出发”、“除了……之外”等。)双音词共 785 个,占总数的

83.8%,另有成语(主要是四字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之类极少。)84条,多音词68个。

就785个双音词而论,构词方式分布如下:

联合式	317	占 40.6%
偏正式	278	35.4%
支配式	118	15%
补充式	24	3%
附加式	22	2.8%
单纯式	19	2.3%
表述式	7	0.9%

很显然,亦是联合式与偏正式居主。

与汉语785个双音词相对应的英语表达形式则多见有词组,如:

插图:illustration in a book.

插秧:transplant rice shoots.

也有少量的单音词形式,如:

嘲弄:mock.

潮湿:damp.

同时,也有大量的复音词存在。然而,在结构特征上却与汉语有明显不同。

英语以复音词资格同汉语双音词相对应的,粗略统计,有313个^②。从构词方式来看,英语的313个复音词可分为单纯与合成二类。合成词中则以附加法居主导地位,计有159词,如:prejudice(成见),rebuild(重建),extraordinary(出奇),frequently(常常),convention(常规),achievement(成绩),composition(成分)。可复合法构成的复音词在英语中则相对较少,只有42例,如:firewood(柴火),output(产量),banknote(钞票),hearsay(传闻),overspend(超支),over-age(超龄),tea-leaf(茶叶)。在复合词中,几乎不见有并列联合的结构,如果说有的话,大约只有hearsay(传闻)大致可算。

视上所述,自先秦文献语言以迄现代汉语,复音词一贯是双音词占优势,联合式居主导,即语音形式上具有骈偶性质,结构组合上则表现有比连事类,会合语义的特征,此即有如汉许慎言文字结构所说的“比类合谊,以见

指归”的“会意”结构。因此,可以说,汉语复音词最典型的特征便是“骈音会意”。

二、“骈音会意”的语言内部条件分析

汉语的语词由单音而走上复音的道路,受着语言交际的实际推动,而语言内部则须具备与之相应的物质条件或基础。

首先,汉语的音节具有可分析性,单音词内部的音素在言语中可能分解而致成复音词,同时,音节的叠合,亦可增加语词的音响长度以构成复音词。在传统的音韵学中,汉语音节被析为声、韵两个组成部分,这是符合汉语实际的科学分析。而这种组合特征,则比较容易同双音节的复音词关联起来。

第二,汉语的语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单音词一直表现得特别活跃。单音词以其丰富的内容,聚合于不同的语义场中,这便为汉语复音词的比类复合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材料,使骈音会意的复音词构造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例如:树有名词义,与木(同层级)、枝(邻近层级)同处一语义聚合序列里,比连起来,即可构成树木、树枝的复音词。又有动词义,和艺在同一语义场,会合二素,便可构成树艺这一复音词。

第三,汉语的结构组织,表现有明显的骈偶比类特征。不必说汉魏六朝的辞赋骈文,也无无论唐代的诗歌和宋元的词曲,单就先秦语言材料,该特征也可谓表现充分。

据笔者初步调查,《诗经》中有双偶对应的句子66组。如:

深则厉,浅则揭。《邶风·匏有苦叶》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卫风·氓》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

百川沸腾,山冢岑崩。《小雅·十月之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小雅·伐木》

自《楚辞》中得57例,如: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

偈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同上)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陟侧。(《九歌·湘君》)

雷填填兮雨冥冥,风飒飒兮木萧萧。(《九歌·山鬼》)

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

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九辩》)

韵文如此,散文作品中,偶对之句也俯拾即是。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跋涉山川,逾越险阻。”“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更是表现突出了。如:“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视上可见,汉语的语句组织的骈偶比类特征是十分突出的。汉语的语词结构与之一脉相承,因此,汉语的组织方略,为汉语复音词的骈音会意结构,提供了构建的框架原则。

诚然,汉语内部各方面均与复音词结构特征相适应,且为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结构图式。但是,汉语复音词何以选择了这种结构图式,并且构造了以骈音会意居主的复音形式,则不是仅凭内部条件的揭示所能圆满回答的,因为它在根本上取决于建造者或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态度,换言之,它与汉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骈音会意”的文化透视

要深入地揭示汉语复音词骈音会意特征的成因,只有将它置于华夏——汉民族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透视,才能得到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汉语复音词是在民族文化的沃土里生长繁衍起来的,它所表现的结构特征积

淀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从语言系统的语词层面,真切的折映了民族文化的面影,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1. “骈音会意”的结构特征体现了汉民族务实尚简的文化品性

在汉语里,无论是历时的比较,还是共时的对比,我们无疑都能感受到汉语单音词大量高频的使用特征。单音词之所以始终活跃于汉人的日常口语甚至书面语中,乃是与汉民族缘于自然经济形态而衍生的“务实尚简”品性密切关联的^[9]。汉语复音词的双音形态同样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深刻影响。

其有本原性的复音词大致是缘起于单音词语音内部结构的转换变化,即“因声关联”。但是,汉语音节的声、韵二合结构以及复音词在投入大批量生产时仍以双音形式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不能不说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了。这深层的原因之一,即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并为汉民族长期奉守的一种价值准则——务实尚简。

张士禄说:“我们发出的语音,必须服从于语言在社会当中的交际作用。一方面要求意义传达的明确,以达到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要节省劳力,使得发音简化^[10]。”汉语的双音复合词,正可实现这种目标。

复音词较之单音词,语义表达趋于明确,对此,前代训诂家已早有认识,因而在其实践中往往加以利用。例如:

《尔雅·释诂》:“繇……,忧也。”注:“繇役亦为忧愁。”

又:“赉、贡……,赐也。”注:“皆赐与也。”

《尔雅·释言》:“谗,念也。”注:“相思念也。”

又:“弇,盖也。”注:“谓覆盖。”

《尔雅·释山》:“山有穴为岫。”注:“谓岩穴。”

上例可见,《尔雅》原文为单音词,而郭璞注以复音词,两相对照,复音词的明义之功便突现出来了。

如果单单在于明义,则三音四音亦未尝

不可,文献中也时见此等用例,如:

《诗经·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楚辞·离骚》:“览相观于四极兮。”

《史记·马服君列传》:“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

又《滑稽列传》:“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

《庄子·齐物论》:“木处则惴惴惧,猿猴然乎哉?”

《荀子·性恶》:“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

然而,对古今汉语的调查表明,三音节以上的多音节固定组合结构为数有限,两个音节的双音词则取得了复音词的绝对多数席位,据有统治权,此即于客观上映现了“节省劳力”的特性,即简约性。这一点也正是与中国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务实尚简”精神相吻合的。因此,汉语复音词形式上趋于简洁的双音节,同时又实现了明义目标,充分体现了崇尚简约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换言之,汉民族“务实尚简”的文化品性对汉语复音词尽量避开多音节而选择双音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骈音会意”的结构特征体现了汉民族对称和谐的审美意识。

对称,即物体、图形基于某一点(直线或平面)在排列分布上——对应。单一的事物无所谓对称,“骈偶”则是对称构架的根本支柱和突出表现。逢年过节,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门的上方形成对称的分布格局;张贴春联,上下相对,前后呼应,则更是对称的典型;乃至橱窗阵列、居室布置,可以说无处不活现有对称的形影。

汉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善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设象喻理。刘勰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对称意识的形成,即或受到了“造化赋形”的启示。大约经由自身而至于动物,因于造化天成的肢体而获得两两相对,平衡对称的表象,进而

扩充延展,及于天—地、日—月、山—水、风—雨、雷—电等等自然现象的彼此对称,及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等社会现象的相应相成。对称的审美意识也由此而形成了。

对汉民族影响至深至远的“中庸”之道,致力于不偏不倚、平衡安稳的常态追求,除了特定生态环境下的物质文化、社会经济制度的作用之外,而在其文化的内层恐怕与对称和谐的深刻体验不无关系的。一条胳膊的人或三条腿的驴子,自然地呈现出倾侧失衡的表征,无疑地给人以偏倚不安的感受。然基于骈偶而构成的对称分布,则不偏不倚,可产生极为轻松的心理反映,给人以和谐安稳之感。故孔子曰:“和无寡,安无倾。”

在汉民族的审美意识中,对称,以其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因而渗透到了各个艺术领域。中国书法,无论字形结体,抑或章法分布,须以平正为宗,即如唐孙过庭言分布所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平正的艺术效果便主要表现于多样中的均衡对称、和谐统一。以“气韵生动”为准则的中国绘画,着墨处常现倾侧不均之象,倘与精心经营的“空处”联系观照,便可领略其虚实相生的“妙境”。因为“画之空处”,正所谓“全局所关”;“画处”与“空处”交相辉映,即可收对称和谐之效。

中国的建筑,特重对称。故宫于中轴线两端形成严整对称,可谓典型。明清以后汉化的佛教寺院亦可为例。寺院的主要建筑:前殿(或天王殿)、正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坐北朝南,置于南北中轴线上。其他配殿则对称地处于东西两侧,如僧房、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库房等在中轴线东侧,而云会堂等组成的“旅馆区”则摆在中轴线以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门殿(通常盖成殿堂式)内所塑的金刚力士像。金刚力士原本是五百名执金刚随从侍卫的首领,即侍卫长或卫队长。他自有在门房负责看门的任务,所以塑于山门殿。早期的寺院里本只有一尊,可是在极重

对称和谐的汉族人心里,这很易造成失衡感,有悖于汉族人的审美习惯,于是,后来便塑成了两尊,对称地排列在山门殿里。

语言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且是文化本身的基础,有着极大的文化运载或文化传播功能。汉语作为最能表现汉族文化特质的一种要素,从各个层面充分体现了双偶对称的审美意识。

汉语音节可析为声韵两个部分,而韵的部分音韵家又分为阴阳,两相对应。汉语语句最基本的节律特征亦是两个音节,如:

关关 雎鸠,
在河 之洲。
窈窕 淑女,
君子 好逑。

——《诗经·周南·关雎》

中国 人民 政治 协商 会议
中国 社会 科学

汉语的词汇,如同义词、近义词或类义词,无论是静止的聚合系统,还是在动态的组合系统中,往往可见形式上的相应对等。如:包谷—玉米、谷—米、稻谷—大米,侵—伐、侵略—讨伐。特别是反义词,尤能反映音节的对称,如:活跃—古板、整齐—混乱、存在—消失。此与英语常附加词缀以构成反义词显示了很大差异,如:active(活泼;活跃)—inactive(不活跃)、regular(合规律;规整)—irregular(不合规则;混乱)、existence(存在)—nonexistence(消失,不存在)。在词义方面表现的对称性,可以“同步引申”为例。“前”表示方位,亦适于时间,相应的“后”亦然,前、后均表现有时空同构的语义特征。“阴”涉及气、光、山、水几个方面,相对的“阳”也同样涉及了这些方面。古汉语的“之”与“其”彼此对应,“之”有指示代词、人称代词、语气助词的用法,“其”也对称地具有这些职能。

汉语语句组织的双偶对称性能表现甚为明显,已如前述。郭绍虞先生曾说:“中国文辞之对偶与匀整,为中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技

巧^⑦。”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于此也有深刻认识,他说:

在《长恨歌》中,白居易歌曰:

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后面二句自不必说,连前二句“行宫一夜雨”、“见月一闻铃”也相对,以同样的结构并列。不仅文学作品,就是进入路旁的茶馆,也可见到“对联”高悬:

坐片刻 不分 你我
吃一碗 各往 东西^⑧

这位外国人能认识到汉语的这种语句组织的对称性 可算是颇具慧眼的。

汉语的句子组织与语词的结构是彼此相通,相互制约的。从审美的角度来观察,骈偶之句“常足以齐整字句,”^⑨可收对称和谐的审美效果,复音词以骈偶的双音出现,也体现了对称和谐的审美特征,而这正是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相吻合的。

3. “骈音会意”的结构特征体现了汉民族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

整体把握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主要思维特征之一。整体把握的方式即是一种“中和”的方式,而中和方式的实质则是注重事物的相互联系,注重对立面的相辅相成,或者说辩证统一。

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从微观到宏观,大致都受阴、阳两性观念的统率,此即突出表现了对立双方相辅相成的认识特征。画家精心经营的画面,“墨处”与“空处”相互映衬,也正是辩证思维的作用结果。对于书法作品,倘能超越“看热闹”而进入“门道”的话,我们所关注的恐不仅仅在于单个文字的笔态间架是否得体受看,而往往须通观全局,体会那流动的线条里蕴含的生机、洋溢的情韵,可感悟到“计白当黑”、相互映衬的整体审美效果。唯其如此,也才算领会了书法艺术的真精神。

辩证运思、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之于汉

语,在各个层面均有体现。语音层面,汉语音节的声韵相辅相成,韵的阴阳相对,体现了结构形式上的对称性,而在其内层,则与辩证统一的思维特征或认识观恐怕不无关系。在语义层面,传统训诂学中的所谓“反训”,便突出地反映了词义所包蕴的辩证观念和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2]。在语句组织层面,汉语喜用偶对。范文澜先生云:“凡欲明言,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且小既嫌孤,繁亦苦赘,二句相辅,数折其中。昔孔子传《易》,特制《文》、《系》,语皆骈偶,意殆在斯。”^[3]此言句之相辅,以明事理,可谓真知灼见。其实上至篇章,下及语词,在组织结构上,又何尝不是贯用“相辅”明义之法的呢?如《诗经》的“重章互足”,复音词“骈音会意”,其根本的用义即在于此。

联合式的复音词,(按,古文献里,有时两字结合不甚紧密,但只要不必分开解释,我们一律视为复音词。)从几个语素的语义关系来看,约可划分同义(含近义)、反义、类义几种,例如:公平、怠慢(此同义),取舍、动静(反义),领袖、句读(类义)。如果用现代语义学的观点来看,则均表现为具有共同的语义要素(义素),即属同一语义场。所谓语义场,“就是由具有某些共同义素的一群词类聚而成的场。”^[4]同一语义场中的各成分靠着心理联想而聚合起来,即索绪尔所说的“联想关系”。^[5]言语中,单独使用某一个成分有嫌含混不明(或不够谐和)时,表达者联想所致便从相互关联的整体聚合系统中选择另一个(或几个)成分来配合使用,这样便构成了一个复音词。接受者一方,由于不只接收到一个单一的符号,而是具有另一参照系——背景符号,即在“文句环境”里又提供有一个“语词环境”,这样对词义的解译,便可更趋明晰。此正如沈德潜说诗所言:“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6]“托物连类”,提供背景,触发联想,即可意会事理内涵。

同义复词,其词素具有彼此注释的效用,例如:《史记·高祖本纪》:“仁而爱人,喜施,

意豁如也。”集解引服虔曰:“豁,达也。”此同义为训,知豁即是达。何晏《景福殿赋》:“开南端之豁达。”此同义联合,构成不必分训的复合词,显见有彼此注释,明确词义之功。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单言之字,说话作文时,有时甚感不便,则复其字以释之。”此说得之。也正因为语言交际中这种同义复合词具有明义之功,所以,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学者们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点以作为训释词义的手段。《说文》中即有大量的用例,如:祐,助也;分,别也;迎,逢也;肌,肉也;稀,疏也。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说文》一类的训诂资料,因对语言学习者丰富词汇、强化同义聚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它们又反过来丰富、强化了同义复合词的使用。

类义组合和反义组合的复音词,在思维特征上与同义复词乃是同理的,即均赖于同一语义场中语言成分,在心理联想作用下而结成。此可举“偏义复词”为例。

偏义复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周代,《诗经》中即可见之。如:《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偏用“陟”。《周颂·闵予小子》的“陟降庭止”,《敬之》的“陟降厥士”则偏用“降”义。^[7]又如:《小雅·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妻子偏指妻,子无义。言妻而连及子,蕴含着相类的心理联想,此明“妻”非《论语·公冶长》“可妻也”之“妻”,“子”非如《论语·微子》之“子见夫子乎”的“子”。解译者在认知中因“妻子”连及而唤起的便是亲属场的聚合序列,从而“以见指拏”,获得词义指涉范围的认识。同时,在“如鼓瑟琴”提供的语句背景映衬下,便可进而明确此“妻子”实只取“妻”的意义。

又如《战国策·魏策四》:“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休祲”彼此对立而统一在表示征兆的语义场中,联合使用,即蕴涵着心理上的对立联想;对于解译者来说,由于休祲彼此制约,互为背景,便规定了思维的路线,亦即是

“以见指撝”。同时,在上下语句环境的映衬下,即可明确这里的休祲指的是“彗星袭月”、“白虹贯日”、“仓鹰击于殿上”之类的凶兆,那么,休祲偏取“祲”义。

因此,联合式的复音词,无论是同义、类义,还是反义组合,根本的构合依据是一致的,即在心理联想作用下,以同一语义场中的几个成分结合而成一个整体,从而“以见指撝”,显明词义。此即从语词构成和解译上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注重联系、讲究辩证统一,善于从整体上认识把握世界的思维特征。

如果说联合式侧重于反映同一语义场中具有共同语义成分的相同特性的话,那在总体上仅次于联合式的另一构词“大户”——偏正式,则可以说侧重于表现同一语义场中成分间的差异性。例如以“视”为核心而构成的偏正式复合词便有:傲视、鄙视、仇视、敌视、怒视、蔑视、漠视、轻视、珍视、重视、斜视、正视、远视、近视等等。由于这些词均含有“以目触物”这一共同的语义成分,所以构成了一个语义场,即以“视”为核心的语义场。构造偏正式复音词,是因为在使用语词时,心理上实存有另外一种或几种“视”,为了加以区别,明确所指,所以增加限定成分,这样,偏正式复音词就形成了。因此,构成偏正式复音词,根本的目的也在于以彼限此,明确词义,而在思维特征上也体现了联系观照、整体把握的认识程式。

综上所述,汉语复音词在语音形式上以双音节占绝对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以联合式居主导,其次是偏正式,因此,我们将结构特征归结为“骈音会意”。汉语复音词的这种结构特征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体现了汉民族务实尚简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讲求对称和谐的审美意识,体现了辩证运思、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

注:

① 参向熹《诗经语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205—228页。

② 参陈克炯《〈墨子〉词汇谭概》,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5期。

③ 据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简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

④ 此种格局于周代金文中已显示出来。可参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兼论汉语复音化的起源》,见《语言学新探》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96页。

⑤、⑥、⑧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第93页、94页、95页。

⑦ 据韩惠言《〈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初探》,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1期。

⑨ 统计时,有几词以对应者,只取第一个。如“出品”:manufacture;make;produce,以manufacture为准。

⑩ 详参王作新《单音词使用的文化成因试论》,《北方论丛》1994年第4期。

⑪ 张士禄《语音和语音学》,载《语文学》1985年第4、5期。

⑫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

⑬ 《论语·季氏》。

⑭ 孙过庭《书谱》。

⑮ 参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港台文艺理论丛书,第161页。

⑯ 参白化文《中国佛教寺院殿堂的典型配置》,载《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二集,中华书局,1986年8月,第193页。

⑰ 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第103页。

⑱ 藤堂明保《中国语概论》,东京大修馆,第45页。

⑲、⑳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㉑ 参王作新《多义系统的文化观照》,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5期。

㉒ 刘伶、黄智显等《语言学概论》,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㉓ 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1页。

㉔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㉕ 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成诗书》。